

主体视角下

农村青年社会流动问题与对策

——以豫东平原 M 村青年精英群体为样本

□ 张 浩

摘 要：改革开放以来，农村青年社会流动呈现出“数量大”但“质量差”的总体态势。本文以豫东平原 M 村青年精英群体为样本，从农村青年的主体视角，分析形成农村青年社会流动态势的内生和外塑两方面原因及呈现方式，并对化解这一现实问题提出了合理建议。

关键词：主体视角；农村青年；社会流动

中国社会阶层固化与社会流动的现代转型，是农村青年实现社会流动的现实背景。从以往理论研究和现实情况来看，学者们大多倾向于从宏观的顶层设计、政策规划和资源配置等层面探寻社会流动的机制问题，对于微观视角下社会流动主体——农村青年及其影响因素没能给予应有的重视。基于此种认识，本文拟从农村青年主体的视角，分析和探讨农村青年社会流动问题，以期深化对这一问题的理性思考和现实观照。

一、社会流动的基本内涵和趋向

正如马克思所说，“现代工业……不断地使社会内部的分工发生革命，不断地把大量资本和大批工人从一个生产部门投到另一个生产部门。因此，大工业的本性决定了劳动的变换、职能的更动和工人的全面流动性”^[1]。由此可见，现代化和社会分工是导致社会流动的根本原因。因此，对农村青年社会流动问题的分析，必须将其置于工业化、城市化的总体进程之中。

1. 社会流动的基本内涵

社会流动，顾名思义，是指社会成员在不同社会地位之间的转移现象和过程。从主体视角来看，社会流动是社会成员身份地位（包括职业）从一个阶层向另一个阶层的变迁过程。然而，社会流动除了表征阶

层变迁的含义之外，还负载着与流动主体生存发展密切相关的一切社会因素的流动，即社会成员及其社会“处境”（“处境”与“环境”相比，更加强调人和人、人和自然的关系，而不是地理性）的整体流动。费孝通先生认为：“在任何处境中，个人可能采取的行为很多，但是他所属的团体却准备下一套是非的标准，价值的观念，限制了个人行为上的选择。大体上说，人类行为是被团体文化所决定的”^[2]。故而，社会成员的地位（阶层）变化只是社会流动的外在表现，社会成员连同其“处境”一起的整体变迁，才是社会流动的根本，体现着社会流动的基本内涵。

2. 社会流动的基本趋势

从人类社会发展的总体进程来看，生产方式的变化从根本上决定着人们生存生活方式的变化。在农业耕作占主导地位的传统社会中，生产力水平比较低，生产关系相对单一。较低的生产力水平和较为单一的社会分工决定了社会流动缓慢，平行流动占据主流，向上流动的机会很少，常常被喻为“鲤鱼跃龙门”。进入现代社会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生产部门越分越细，经济往来越来越频繁，“一个资本家作为商品生产的产品越来越专门化，互相补充的各个生产过程越来越分裂为独立的生产过程”^[3]。生产领域的这一客观变化，直接导致社会成员在不同部

门之间流动的频次不断增加，流动方式日趋多样化，实现社会流动的机会、途径日趋增多。

就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来看，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因素在不同社会发展阶段上，直接或间接、外显或潜在地影响着社会成员的阶层流动方式和频次。总体来看，改革开放以前，政治因素发挥着主导作用，“人们的社会地位与其说决定于他们的经济收入和财富地位，不如说取决于他们在高度集权的计划体制和政治化社会结构中的位置”^[4]。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因素的影响不断提升，尤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建设，“扩大了就业空间，改变了职业结构；扩大了社会经济差距，推动了社会分化，催生了一些新社会阶层，改变了各个社会阶层在整个社会结构中的经济社会地位和相互关系，形成了一个现代社会阶层结构雏形”^[5]。总之，社会流动呈现出一个由封闭到开放、由相对固化到相对流动的过程，这是社会流动的基本趋势。

二、农村青年社会流动的现状呈现 ——基于M、T村的实地调研

选取M村作为调研样本，是因为M村与同一区域内其它村庄相比，培育出更多具有独特文化品质和较强流动意识的青年精英群体。在对M村进行深度调查和访谈的同时，课题组还对该区域内相邻村落农村青年社会流动（尤其是以升学方式实现流动）情况进行了选择性调研和分析，比如T村，其情况与M村大致相似，也是周围有名的“大学生村”。再如其他村庄，农村青年社会流动的规模也许赶不上M、T村，但相较于其他区域农村来说，也具有一定优势。基于该区域内不同村落在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同质性”的考量，本文仅就M村这一个案进行分析和研究。

M村地处中原传统农区腹地，在数千年的文化传承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完整形态的农耕文化传统；另一方面，这一区域自汉唐以来，水利失修、秩序混乱、灾害多发，使得在这一区域谋生活、求发展的青年群体，具有较强的危机意识和奋发向上的动力。这一区域文化特色和青年特质，决定了农村青年社会流动规模相对较大、流动方式独具特色，对该样本进行理性分析，具有典型示范意义和价值。

课题组采取问卷调查与深度访谈相结合的方式，就M村青年群体社会流动的情况进行调研。改革开放以来，M村以升学、招工、参军、结婚等方式实现

社会流动的总人数251人，其中，有218人（占流动总数的86.9%）以升学方式实现流动。课题组以5年为一个时间段进行统计，具体情况如下：

表1：改革开放以来M村青年流动数量与方式

流动时间	社会流动方式						总数
	升学	参军	招工	经商	打工	其他	
1980年前	8	1		1			10
1981-1985	14	1					15
1986-1990	37	2	2		3		44
1991-1995	25	1	5	1	2		34
1996-2000	29	3	2	1	2		37
2001-2005	41	3	1		1		46
2006-2010	64		1				65
共计	218	11	11	3	8		251

从表1数据可见，改革开放以来，M村青年精英群体社会流动的总量大体上呈逐年递增的趋势，尤其是以升学方式实现社会流动的群体在数量上占据绝对优势。就升学方式实现社会流动的情形来看，随着社会发展，流动规模越来越大的趋势越显著，呈现出如图1所示的曲线形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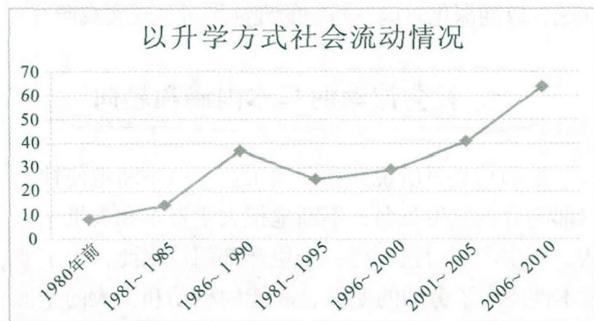


图1：改革开放以来M村以升学方式实现流动趋势图

然而，伴随着访谈工作的逐渐深入和调研数据的比照分析，一种隐匿在M村青年社会流动“数量大”背后的另一个特征，即M村青年社会流动“质量差”的现象，也越来越清晰地呈现在理论和现实的交汇中。农村青年社会流动的量与质之间的巨大张力，引起了课题组的高度关注。

另一方面，在深入 M 村进行访谈过程中，大家普遍表现出对农村青年实现社会流动的一种担忧。以升学这一主导方式来说，村民普遍表示出“不好就业”、“没人找不到好工作”等悲观态度。课题组以《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关于阶层划分标准——“以职业分类为基础，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状况为标准来划分社会阶层的理论框架”为参考，结合农村青年社会流动的实际，把由农民阶层向“企业领导、高校教师、公务员、城市中小学教师”等职业的流动，视为向上流动的群体；而向“工人、农村中小学教师”等职业的流动，视为平行流动的群体。按照这个标准对 M 村改革开放以来人员流动情况进行大致的统计分析，结果如表 2 所示。

从表 2、图 2 可见，M 村青年社会流动的质量和数

表2：改革开放以来M村以升学方式流动的质量分析

流动时间	向上流动		平行流动		向上流动所占比例 (%)
	升学	其他	升学	其他	
1980年前	5	1	3	1	60.0
1981~1985	8	1	5	1	60.0
1986~1990	17	2	20	5	43.2
1991~1995	12	3	13	6	44.1
1996~2000	4	2	25	6	16.2
2001~2005	8	2	32	4	21.7
共计	54	11	98	23	

注：2006~2010年，因75.4%的人是在读大学生，因而其流动结果无法确定，不与统计。



图2：改革开放以来M村以升学方式实现向上流动趋势图

量呈现出两种相反的趋向。除去偶然性的影响之外，改革开放以来，M 村青年精英群体的社会流动具有比较优势，数量上呈逐年上升的趋势；而从实现向上流动的人员来看，这一比例在逐年下降。这一数据与访谈结果基本一致。这一“流动数量”与“流动质量”间存在的现实矛盾，形成了当前我国农村青年社会流动的真实写照。

三、农村青年社会流动的追因分析 ——基于主体的思考

农村青年社会流动是一个由众多因素构成的复杂社会问题，基于主体视角来分析和解决这一现实问题，不仅存在着逻辑上的严密性，而且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就 M 村青年社会流动中出现的“异常”趋向来说，其成因主要表现在“内生”、“外塑”两个层面。

1. 内生性因素

英国学者波兰尼把人类的知识分为“隐性知识 (implicit knowledge)”和“显性知识 (explicit knowledge)”两大类，其中，能够以文字、图表和公式等符号形式加以表述并可以系统地传授和学习的知识，是“显性知识”；而“隐性知识”通常只能意会而不能言传，不能以规范的教学形式加以传递，是难以言说的知识^[6]。因此，对于 M 村青年群体来说，来自“大传统”显性知识教育和“小传统”隐性知识获取，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关联或疏离）等，相对于政府部门的顶层设计和行政规范来说，它们是内生的，因而，对农村青年社会流动的影响也比较大、比较深。

(1) “大传统”的影响

M 村是一个有着悠久教育传统的村庄，规范化显性知识的传授历来受到地方精英阶层和群众的重视。通常来说，显性知识的教育来自“大传统”主流的文化和价值观念，具备显性知识的人相对来说更加容易实现社会流动，融入现代城市生活之中。当调研员提问：“M 村为什么在社会上获得一个‘大学生村’的称谓”时，村长如是说：“解放前村里的地主和大户人家出钱，从外村专门去请教书先生，在我们这里办学。解放后，我们这里先后兴办了小学、中学，附近十里八村的娃娃，都到这儿上学。”M 村对显性知识教育的重视，由此可窥一斑。正是由于对来自“大传统”规范化教育的重视，使得 M 村青年平均接受规范教育的年限比较长，受教育水平比较高，为 M 村青年实现社会流动奠定了良好的教育基础。

另一方面，来自“大传统”规范化教育理念、目

标、内容、方法，以及评价标准等方面，都与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相适应。其教育理念上的“人本性”，教育目标上的“时代性”，教育内容上的“针对性”，教育方法和评价上的“科学性”等，使得“大传统”教育下培养出来的人才，具有更强的社会适应能力，更加符合社会主流价值观念。因此，也更容易使实现流动的农村青年融入现代社会生活之中。

(2) “小传统”的影响

M村青年在接受显性知识规范教育的同时，还受到来自“小传统”的地方性知识的教化和熏陶。美国人类学家罗伯特·雷德菲尔德把“小传统”描述为以零散、非系统化的生活文化，其实质就是被波兰尼称作的“隐性知识”，它具有显著的地方性特质。“在我们村子，已经形成重视教育、培养大学生的氛围。改革开放前，在大伙儿生活都还不富裕的情况下，谁家小孩儿考上学，村里给放电影（祝贺），拿路费，全村人都得对人家高看一眼。家长也重视呀，有学问的人就是种庄稼也能种好，啥都讲科学嘛。”村长以其朴素的语言风格，向调研组描绘出一种生动的、地方性知识及其对农村青年成长的影响。

M村浓厚的地方文化对农村青年成长和发展的教化作用，与来自“大传统”的显性教育相呼应，一方面促使和强化规范化教育的作用和影响，使M村青年的社会流动在绝对数量上呈现日益增多的趋势；另一方面，“小传统”自身所具有的偏狭性，又使得农村青年在人生理想、目标和信念上形成“短视”，反过来制约和影响了农村青年社会流动的质量和效果，导致M村青年的社会流动呈现质量差的格局。因此，打破大、小传统间的疏离局面，实现两者之间的融通，是消解农村青年社会流动问题的基本途径。

2. 外塑性因素

正如马克思所说：“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7]。因此，政府部门的顶层设计和制度安排，以及与农村青年密切相关的社会因素等，构成了农村青年社会流动的外塑性因素。对于地处中原农区腹地的M村来说，外塑性因素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 “三农问题”形成的惯性

“三农问题”是指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过渡中形成的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城市化建设滞后、农民市民化进程受阻的社会状况。这种情形，由于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相对单一的工业化进程，长期稳

定的二元社会布局等因素的影响，呈现出更加复杂的局面，事实上也就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特殊性。

正如杨国荣所说，“现代性既以观念的形态折射了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变革，又对现代化过程具有内在范导意义”^[8]。作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主体力量的农村青年，不是“留在知识精神和政治精英的记忆里及对象化在文献里”^[9]的符号化“农民”，而是处于活生生的、现实生活中的人，人的思想、人的心理、人的行为的形成，与其生存、生活其中的社会整体进程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共同演化出一幕独具特色的、中国式的农民现代化。因此，中国现代化给农村、农业和农民所带来的持续影响，凝结为农村青年独特的个性、心理和素养，成为促进或阻滞其社会流动的重要因素。对于M村青年来说，这一过程的负面作用，如开拓精神不足、合作意识不强等更为明显，使得他们在实现社会流动的自觉性上存在严重的“先天不足”。

(2) 市场经济建设的影响

市场经济是现代化进程的核心内容，其对社会发展尤其是人们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及生存方式等方面的影响，尤为复杂、深化。在促进人的发展方面，市场经济通过市场机制中的价值规律、供求关系、利益竞争等途径，实现着“马太效应”般“穷者愈穷，富者愈富”的作用和影响，其结果是城市与乡村、农民与市民、农业与工业之间的差距被不断拉大，两者之间的界限被不断强化。因此，市场经济建设通过“三农”问题的凸显，成为制约农村青年社会流动的外塑性因素。

在改革开放初期，市场经济建设打破了计划经济体制对农村青年职业固化的束缚，为农村青年规模化社会流动提供了可能，开辟了途径。“从1949年以来的发展历史看，计划经济也有农业劳动者向非农转移的情况，但是只有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农民才有了自主择业权力，才有了农业劳动者的自主流动”^[10]。然而，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日益完善，其在社会资源配置方面的自发作用日益彰显，农村青年在经济资源、政治资源、文化资源和教育资源等方面的相对劣势不断强化。因此，市场经济建设对于农村青年社会流动来说，其“双刃剑”效应日益成为阻滞社会流动的主导因素。

四、基于主体构思的农村青年社会流动的实现路径

正如马克思在批判费尔巴哈时说的，“他把人只

看作是‘感性对象’，而不是‘感性活动’，因为他在这里也仍然停留在理论的领域内，没有从人们现有的社会联系，从那些使人们成为现在这种样子的周围生活条件来观察人们”^[11]，用费孝通先生的话说，就是脱离了社会成员生存发展的“处境”来谈论社会流动问题。因此，从主体视角来分析农村青年社会流动这一现实社会问题时，不能脱离其具体现实的社会“处境”，否则就会犯与费尔巴哈同样的错误。基于社会流动的整体考量，实现农村青年社会流动的现实路径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 增强农村青年主体意识

农村青年，尤其是农村青年精英群体，由于在自身素质上具有的比较优势，使其成为农村社会流动的主体，因此，不断增强农村青年主体意识，提高其对社会流动中的自觉性，就显得尤为重要。一是通过各级各类教育活动的引导，增进农村青年对社会流动机制的了解，只有帮助他们做到“知己知彼”，方能达成“百战不殆”的结果；二是通过广播、电视、互联网等途径，帮助农村青年了解城市生活、工作，以及现代社会发展对人才需求状况等，调动其实现社会流动的自觉性、主动性。

2. 提升农村青年价值认同度

从M村的实际情况来看，通过新型农村社区文化、道德建设，努力实现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与“地方性”文化和道德的融合，建构起具有地方性、现代性、创新性等特征的新型农村社区，提升农村青年群体价值认同度，是实现农村青年社会流动的根本途径。一方面通过农村青年对社会主义主流文化、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接触，可以有效消减农村青年身上附带的“土味”，缩小其与现代生活间的差距；另一方面，通过农村青年价值认同度的提高，可以不断提升农村青年主体间的契合度和整体实力，从而增强农村青年社会流动中的合力。

3. 实现大、小传统有效对接

在影响M村青年社会流动的诸多因素中，教育无疑是最重要的。因此，完善新型教育体制，打破“大”、“小”传统之间相互疏离状况，实现两大传统在教育目标、教育内容、教育方法等环节上的有效对接，是提高农村青年自身素质，加速社会流动的根本途径。一是实现教育目标上的统一，即个体发展目标与社会人才需求目标的统一；二是实现教育内容上的整合，即“大传统”正统化显性教育以其社会发展高度适应性与“小传统”零散化隐性教育以其与农村青年高度契合性而形成互补、整合；三是实现教育方法上的创新，即“大传统”教育方法的系统性、规范性与“小传统”教育方法的生成性、情境性的融通等。

4. 彰显后致性因素在社会流动中的作用

在传统社会中，社会成员凭借其与生俱来的如家庭、出身、性别、地位等先赋性因素，在社会流动过程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在当今社会中，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日益完善，“政治、政策和制度安排等先赋性原则，逐渐被以努力和能力为主的后致性原则所取代，社会流动走向公平时代”^[12]。然而，由于旧机制自身存在的缺陷，使得后致性因素对农村青年社会流动的积极作用难以真正发挥。为此，必须致力于新型社会流动机制的构筑，以彰显后致性因素对农村青年社会流动的积极作用，以更多地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

[基金项目：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新型农村社区道德建设问题与对策研究”（2012BZX001）的阶段性成果]

张浩：周口师范学院豫东南文化传承与发展
研究中心研究员，副教授，博士
责任编辑：王珑玲

参考文献：

- [1][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12、32.
- [2] 费孝通.乡土中国[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241.
-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五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43.
- [4][5][10] 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33、34、342.
- [6] Michael Polanyi. Study of Man [M].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8.12-31.
- [8] 杨国荣.科学的形上之维[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181.
- [9] 黄琳.现代性视阈中的农民主体性[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10.48.
- [1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7-78.
- [12] 杨黎源.从先赋到后致:新中国60年社会流动机制嬗变[J].浙江社会科学,2009(11).